

Z 文人逸事

启功诗赞《半月谈》

夏明亮

1985年冬,《半月谈》杂志创刊五周年,启功应邀创作了一首七言绝句《小诗奉题半月谈杂志》:“朔望兼评胜汝南,民情国是共相谕。删繁摘要珊瑚网,温故知新半月谈。”诗作用典贴切,内涵丰厚,古意盎然,新见迭出。其中第一句和第三句,分别嵌入两个富有象征化的典故,使全诗更加典雅厚重,耐人品味。

第一个典故是“月且评”,又称“汝南评”,典出《后汉书·许劭传》,说的是东汉末年,汝南郡人许劭,许靖兄弟主持在清河岛上开办清议讲坛,对当时的人物进行品评,常在每月初一发表评议结论,一时影响朝野舆论,被誉为“月且评”。诗的首句“朔望兼评胜汝南”中的“朔”,又称新月,指农历每月初一;“望”,则称月圆,指农历每月十五。“朔望兼评”紧扣“半月谈”刊名,不仅契合刊名的内涵,又与古代的一段品评佳话相媲美。

第二个典故“珊瑚网”,语出《新唐书·西域传》:“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船,堕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

而黄,三岁赤,枝格交错,高三四尺。铁发其根,系网船上,绞而出之,失时不取即腐。”说的是,用特制细密铁网迅速捞起的珊瑚树,得到的不仅是奇珍异宝,而且因其打捞及时,保持住了新鲜本色,不会腐烂变质。诗人巧用典故,借喻《半月谈》张开珊瑚网,捞起新海洋,力避“失时不取即腐”,广泛搜集天下要事和最新信息,进行提炼粹粹,突出刊物既要言不烦文风精神,又内容鲜活讲解及时的办刊风格。

诗的第二句“民情国是共相谕”,突出了刊物面向基层,讲解时政,把握党心民意的交汇点,上联天线,下接地气,力争使上下两头都满意的办刊理念。第四句“温故知新半月谈”,突出刊物心中装着读者的需求,在形势政策教育、时事考试等方面设置与读者需求相链接的特色栏目,发挥了“时事政策顾问、学习生活益友”的特有功能。

仅仅只有四句的小诗,句句紧扣《半月谈》的核心理念和功干特色。有人评曰:启功此诗“堪作半月谈品牌的宣传广告语”,启功其人“堪称《半月谈》的真知音”。

李四光为武汉大学选址

王剑

1928年初,蔡元培推荐李四光担任武汉大学新校舍筹备委员会委员和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

李四光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对大学选址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大学校园应当“山有水,动静相宜,方能启迪学生之灵性”。在此理念引导下,李四光首先把新校址选在了洪山脚下。后来筹委会委员叶雅各到武昌县调研,发现“卓刀泉东湖嘴一带”环境不错,便极力向李四光推荐。李四光等人带着干粮,骑着毛驴,来到珞珈山下,看到这一带山石峥嵘,景色秀丽,他们被陶醉了。李四光一遍又一遍地说:“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校址了!”随行的委员也都交口称赞。回去后,李四光主持了武汉大学筹委会第二次谈话会,正式确定武昌东湖珞珈山一带为武汉大学新校址。

11月底,李四光到上海物色新校舍总建筑师人选,最终选定深谙中国工程技术的美国工程师开尔;又请来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缪恩科教授做监理工程师。开尔

斯先是乘坐飞机在珞珈山上空俯瞰校区全貌,次日又登山实看,建议将新校址由珞珈山南麓改至北麓,以狮子山为中心,各院系教学楼分别建筑在小山上,南麓则建成18栋欧式别墅,作为宿舍区。

李四光接受了这个提议。于是,他带领武大人在珞珈山一带开拓洪荒,辟山建校,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将这片原本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变成了美丽的大学校园。1932年5月26日,武汉大学隆重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李四光作为筹委会代表到场祝贺,他说:“十年前,我在回国途中曾经设想,要在一个山有水的地方建设一所大学,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校方请他题词,李四光拿起毛笔,写下两行大字:“用创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求人生的出路”。

如今,在武汉大学第四教学楼对面的树丛里,矗立着一座雕像:李四光站在一头毛驴旁,举手遮阳远眺,正深情注视着他曾洒过汗水的珞珈山和东湖。这就是他当时选择校址时的场景还原。

吴昌硕结缘梅兰芳

周惠斌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喜好书画,早年在北京曾师从汪蔼如学画,后来在上海拜花鸟画家王梦白为师,抗战时期还随汤定之学画梅花。

梅兰芳在1913年和1914年两次到上海演出,经友人介绍,与书画大师吴昌硕相识。彼时,吴昌硕已年届70,梅兰芳年仅20岁,两人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之交。吴昌硕深爱梅兰芳的京剧,时常去观赏他的表演。梅兰芳虽未正式拜师吴昌硕学画,但一直以礼师事吴昌硕,讨教绘画的图案和色彩,以期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后来,梅兰芳每次到上海演出,都要到吴昌硕府上拜访,游园作画。吴昌硕非常器重梅兰芳,他曾对弟子们说:各种艺术有相通之处,戏剧演员能在业余学习绘画,像梅兰芳这样勤学苦练,将来必有大成。

1920年,梅兰芳在上海演出结束,

返回北京前,专程向吴昌硕辞行。吴昌硕赠送给梅兰芳一幅《梅花图》,并题写了两首《为晚华画梅》诗:“翻风舞袖翠云翘,嗔气如兰堕碧霄。寄语词仙听仔細,导源乐府试吹箫。”“画堂崔九依稀认,宝树吴刚约略描。梅影一枝初写罢,陪君禅语立香南。”

1921年4月,吴昌硕之子吴东迈离京,梅兰芳画了一把“花卉绶带鸟”扇面,请他带回赠给吴昌硕。吴昌硕收到后非常高兴,亲笔题跋留念:“客岁春夏间,晚华来沪,有过从之雅,尝作画奉贻,别去匆匆逾年矣。迈儿归自京师,出画扇,则晚华之贻,画尤美妙。当设色写生时,必念及缶庐颜老,重可感也,迈能珍惜之。溷尹(词人朱古微,字疆村)曰:是亦善承旨也。辛酉大年暑日,书此一京。时年七十八。”吴昌硕在长跋中对梅兰芳推崇有加,亦见证了他们忘年之交的深厚情谊。

刘海粟办美专

周星

1912年,17岁的刘海粟背着200块龙洋去上海闯天下。他准备用这笔钱帮自己的老师周湘把布景画传习所扩展为图画美术学校。

到上海后,他迅速找到自己同学乌始光,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对方。两人一拍即合,立刻带上龙洋去找周湘。当周湘看到刘海粟带来这么多钱时,大为震惊。当他听完海粟的来意后,被深深地感动了。但此时的他办学失败,早已对办学已失去了信心,直接表示想把教具、设备和校舍盘给刘海粟,并鼓励他开辟一个新天地。

刘海粟听后犹豫了,不知如何是好。周湘见状,连忙安慰他说,自己早有盘给别人想法,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东道主。如今刘海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又有办绘画传习所的经验,由他来办学,定会有很好的发展,自己也就感到欣慰了。

刘海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老师的激励下,他和乌始光决心共同创办中国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为中国扩展新美术打天下。万事开头难。为了办好学校,乌始光还辞掉了先前的工作,全身心

地投入到了办学之中。

与此同时,刘海粟起草了办学宣言。一是我们虽没有什么学问,却自信有这样研究和宣传的诚心;二要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三要在极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艺术可以救济现代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醒一般人的睡梦。

刘海粟写好这份宣言,又想起了姑父曾经就读苏东坡的《赤壁赋》时对他的教诲:“休得目中无人,再有成就,比起前人,也犹似东坡所说:‘渺沧海之一粟’,自大谓之‘臭’。”他的心灵顿时受到了猛烈的震撼,事业刚刚起步,决不可自骄自大。为了时刻警惕自己,他决定改个名字,提笔就在《宣言》的后面写上了“校长刘海粟”五个字。他还动手制作了一只木框,蒙上白布,将几支毛笔绑在一起,写上几个醒目的美术大字:上海图画美术院。

1912年11月23日,刘海粟和乌始光把这块自制的街牌,挂到了上海南浦路上一幢普通的石库门门前。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就这样诞生了。

追寻民盟人创办的《新蜀报》

胡雁冰



《新蜀报》

《新蜀报》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的“党报”,存在了29年、出版了10579期,它是重庆第一份新闻性日报,也是重庆近代史上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大报,它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价值值得挖掘和研讨……

民盟先贤倡导主办

1919年,四川青年王光祈、陈愚生等6人和李大钊发起成立了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张澜得知情况后,安排秘书杜象邀请王光祈、陈愚生面谈。

当时的四川地理位置偏僻,资讯比较落后,报刊很少,他致函民盟发起人之一的鲜英,嘱咐他与陈愚生在重庆办报,在四川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蜀报》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鲜英欣然接受张澜的安排,马上联合川东道尹叶秉诚、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沈与白以及重庆城防司令袁承武共同出资1万余元办报,并担任董事长和发行人。陈愚生(少年中国学会副主任,1923年因病辞世)与刘涓英(著名报人,曾任新中国日报董事长、青年党中央秘书长)分别担任第一任社长与总编辑。

1921年2月1日,《新蜀报》创刊,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宗旨。土纸竖排单面印刷,日发行量最高2万份。由于连续刊文支持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为,最终触怒反动当局,《新蜀报》报社遭到查封,陈愚生被迫辞职。后经张澜等人疏通,聘请周钦岳任总编辑,复刊发行。

中共党员接力主笔

周钦岳担任《新蜀报》总编辑后,聘请从法国勤工俭学一同归来的陈毅担任“域外见闻”等栏目的主笔,至1926年,陈毅共发表时评、短篇小说、白话诗和杂作等十多万字。

陈毅1923年去北京读书后,周钦岳改聘1922年加入中共的萧楚女担任主笔。萧楚女曾被誉“四川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启蒙运动旗手”,1923年6月,他在《新蜀报》上开辟与读者互动的栏目“社会青年问答”,文笔犀利、风趣幽默。两年里,他以激昂深刻的文字,赢得了读者喜欢,被当时的知识界称为“青年的百科全书,黑暗中的领路人”。这期间,报纸发行量达到3000份,占重庆报纸的1/3。也因此深为军阀憎恨,最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5月推出的“新蜀报四千号”发行纪念册上,称萧楚女为《新蜀报》的第一个大功臣。

1927年“三·三一”惨案爆发,《新蜀报》总编辑周钦岳和经理宋南轩被迫离开重庆。报纸生死存亡之际,鲜英重新担任社长,聘请杨丙初担任总编辑,一同努力带领《新蜀报》走过艰难岁月。

周钦岳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

11军第26师政治部主任,后参加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秋,经当时的社长袁承武专函催促,周钦岳返回重庆,续任《新蜀报》总经理、社长。

1949年11月,周钦岳赴北平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涤新废旧启迪新机

萧楚女被驱逐后,周钦岳又邀请国民党左派、经济学家漆南薰担任主笔。从1925年秋到1927年3月31日牺牲,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漆南薰积极热情地宣传革命,几乎每天为报纸撰写一篇“社论”或“时评”,此外还写了大约300篇文章,近百万字。

《新蜀报》意见独立,观点明确。1935年1月1日在《本报改版启事》申明:“国家民族之立场,即为本报之立场,人民大众之公意,即为本报之意见,凡足以推动时代,有利国家民族者,本报不竭诚努力,否则,亦尽量指陈,垂涕纠正。此为本报之根本立场,过去如此,今后自亦当如此。”

抗战时期,重庆有史以来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指挥和外交活动中心。到1939年底,全市登记注册的报纸共20家。1941年5月左右《新蜀报》销售量已经接近7000份,几乎可以与《大公报》齐肩。

抗战期间,各报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新蜀报》也不改“民众喉舌”本色,敢为人先——

1937年冬,《新蜀报》记者温田丰由上海,转武汉,经西安,进入陕北,于1938年1月14日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四度通信。毛泽东以幽默而通俗的话语,肯定地说:“只要不怕困难,勇于牺牲,抗战必然胜利!”同时挥毫落笔为《新蜀报》题写了一张条幅:发扬正气,建

设新四川,造成抗日战争的有力根据地。

温田丰写成的《延安通讯》《毛泽东的印象和谈话》等文章,首次在重庆报刊向重庆读者介绍陕北的风貌及中共领袖的风采。

1939年1月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等国民参政员在鲜英公馆“特园”发表宣言,反对汪精卫的叛国罪行,宣言送到重庆各家报馆,《新蜀报》一家登载,此为大后方公开声讨汪逆罪行的先声。

1939年2月1日《本报十八周年纪念》描述:“本报诞生,恰当战后新思潮澎湃之际,发刊地域,是在号称‘魔窟’之四川,报名新蜀,顾名思义,原期涤除废旧,启迪新机。”

见证民盟盟员成长

抗日战争时期,是《新蜀报》在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时任社长周钦岳为报社延揽了一批文化人才甚至大家,如漆鲁鱼、姚蓬子、金满成、高天、萨空了、刘尊祺、温田丰、赵铭彝、萧崇素等人到报社工作,像老舍这样的文化名人也为报纸撰稿。萨空了等人后来加入民盟,成为重要成员。

1940年萨空了经范长江介绍进入《新蜀报》,“皖南事变”爆发后他被迫离开重庆到达香港,恰逢梁漱溟在香港创立民盟中央机关刊物《光明报》,应邀担任了报社经理。

1942年冬,周钦岳聘请高天接替萨空了的工作,后被国民党压迫离开。1946年前往香港加入民盟,担任民盟香港、九龙支部执行委员兼秘书长,1949年8月参加民盟总部机关报《光明报》组建工作,担任第一室主任。后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赵铭彝1936年就进入《新蜀报》工作,在他的影响下,成为抗战时期宣传话剧的最有成绩的媒体,抗战胜利后加入民盟。

后来任重庆民盟主要领导人的冯克熙,经曹禹介绍认识了赵铭彝,被

赵引荐给周钦岳,旋即被安排进编辑部工作。这是他参加革命、投身民主运动的重要起点。冯克熙1945年在重庆加入民盟,后来成为盟内有影响的活动家。

勉励创新影响日深

《新蜀报》堪称重庆报界翘楚,在很多方面开风气之先——它最早与读者互动,坚持每日出版,采购新式转轮印刷机,改用电气铸字,还是抗战期间重庆200多家报刊中唯一一张能够套红的报纸。

副刊也是《新蜀报》的一大特色。最初,副刊名为“文峰”,后改为“蜀道”。抗战时期,《新蜀报》副刊开辟的“金刚钻”“新副闲话”栏目备受读者喜爱。他们把“一钻日本帝国主义,二钻勾结敌人之汉奸,三钻贩卖仇货之奸商……十钻一切不合理的语言行为”作为自己的目标和策略。“金刚钻”每天用二三百字嬉笑怒骂的短文,揭发抨击一人或一事。“新副闲话”专栏始终不与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妥协。“蜀道”还展开过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受到文艺界的注目。

1936年10月31日《新蜀每周周报》创刊,8开2版,每周六出版,王敦主编。内容多为反映抗日的时事照片、漫画、木刻等,有时也有艺术照和关于美学的论文。

《新蜀夜报》是《新蜀报》的晚刊,1937年12月15日创刊,发行人由《新蜀报》总编辑杨丙初担任,日出4开1张。该报没有社评和短评,设有言论性专栏“金刚钻”。

抗战时期,《新蜀报》先后开辟了多个文艺副刊来宣传抗战文艺,其中,“蜀道”跨度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特征也最为明显,从诞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始终坚持“进步”和“兼容”并举的编辑方针,成为推动重庆抗战文学进程的主力军,更成为了全国抗战文艺的一面旗帜。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政协原社法委主任)

许寿裳与鲁迅的手足情

崔鹤同

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比鲁迅小两岁。1902年,他们在日本弘文学院结识。由于共同的革命志向和在文学上的合作,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1908年,许寿裳介绍鲁迅加入了光复会。1909年4月,原本想赴德留学的许寿裳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鲁迅因二弟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家里经济负担加重,也不能赴德留学,便向许寿裳求助。由于许寿裳向新任监督沈钧儒力荐,鲁迅得以到学堂任教,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辛亥革命之后,许寿裳到教育部任参事,就向总长蔡元培力荐鲁迅进入教育部,使鲁迅由一个乡村中学教员,“摇身一变”成为京城的国家公务员。鲁迅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中,曾提到过这件事,说“季葦写信

来催我了”。

在教育部供职期间,两人朝夕相处,昼则同桌办公,夜则联床共话。许寿裳给予鲁迅多方面的切实帮助。1922年夏,许寿裳出任国立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延聘鲁迅先后在女师大担任讲师、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和国文系教授。

1927年夏,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生活拮据。这时,国民政府决定组织大学院,秘书身份的许寿裳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再度力荐了鲁迅,担任“特约撰述员”,每月薪金300元,可以说是给鲁迅雪中送炭,也使他后来能在上海能安心写作。

当然,鲁迅也给许寿裳施过援手。1926年8月,鲁迅到了广东任教,马上设法请中山大学聘许寿裳为教授。鲁迅在上海,许寿裳的女儿患

病到上海求医,鲁迅为之奔走医院,担任翻译,颇为热心。

1936年鲁迅病重,当年5月许寿裳专程去上海探望。许寿裳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写道:鲁迅“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颊瘦得像败落的丝瓜。”7月1日,他又到上海慰问鲁迅,并“竭力怂恿出国疗养,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其情殷殷,其心拳拳。7月10日,许寿裳又看望鲁迅。鲁迅将1935年底写赠许寿裳的题诗《亥年残秋偶作》:“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茫茫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浑蒲尽,梦坠空云齿齿寒。窥镜荒鸡偏闹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取出给许寿裳。鲁迅还强撑病体,送他到楼下门口。想不到,这竟是他们的永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的时